

民國學人 從政記

李村○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真偽難辨

胡適與宋子文	8
再說胡適與宋子文	23
胡適一九四九年赴美之行	33
胡適為甚麼不做行政院長	41
胡適與「第三黨」問題	51
胡適與「第三勢力」	62
「吳國楨事件」中的胡適	69
胡適是學者還是政客	78
胡適的胸襟與氣度	86
師生之道	95

書生從政

傅斯年書生誤國	100
再說傅斯年書生誤國	114
蔣介石的錯誤：說翁文灝	122
我看何廉這個人	134
從蔣廷黻說起	143
不失書生本色	154
學者從政之後	162
宋子文的傲慢	170
馬寅初、傅斯年、費肇：同罪不同罰	179
偏聽則明，兼聽則暗	187

世事難料

歷史不能輕信	198
書生情是一張紙	208
顧維鈞的結局	218
早期留美學生之「兄弟會」	234
我所知道的王造時	244
有關王造時的補記	254
吳國楨與葉公超	257
秦德君、茅盾、穆濟波	265
劉尊一與潘宜之	277
續說劉尊一與潘宜之	286

世風士像

林庚白其人	294
吳虞與吳宓	304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北京	312
政學之間	321
學者之間的應酬	329
五四以後的新舊之爭	339
後記	348

真
偽
難
辨

胡適與宋子文

從一九三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九月，胡適任駐美大使四年。他這四年使美外交的成敗，歷來眾說紛紜，而所有爭論的焦點，都與宋子文有關。例如楊天石先生在《排擠駐美大使胡適》一文中，便根據胡佛研究院收藏的宋子文檔案，認為宋子文在美國任蔣介石私人代表期間，一再地「排擠」胡適，胡適的去職即是宋子文排擠的結果。這些材料雖然都有案可查，但宋子文之於胡適不算「排擠」，抑或反倒是胡適在「排擠」宋子文，恐怕還是問題。客觀地說，胡適在任駐美大使期間，以他的學識和人格，給美國人留下很深的好感，因此他被免職後，蔣介石委任魏道明為駐美大使，美國政府很不暢快，拖延了三個星期，才同意接受這位新任大使。美國的新聞媒體對胡適的離任，更公開表示了惋惜。

但是胡適擔負的大使，很難說是「全職大使」。他剛一上任，就提出一個「四不主義」：不談借款，不談軍援，不做宣傳，也不搞募捐。^①他認為駐外大使的職責是「為國家做點面子」，要把時間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不能分心於雜役。要求政府另派專人處理這些具體事務。姑不論他對外交官職務的理解是否正確，當時對美外交的核心任務，就是爭取美國政府的同情與援助。國民政府在這方面

「所望於美方者至深」，早在胡適使美之前，工作已經在積極進行。所以他這種清高態度，不但令政府失望，也讓一些職業外交官感到難以理解。顏惠慶在日記中說，一九四〇年初，他曾奉蔣介石之命，藉出席太平洋學會年會之便去華盛頓見過胡適，詢問有關美援問題的進展。胡適「回答時吞吞吐吐，只列舉了不少無關輕重的情况」，令顏惠慶大失所望。可以想見，顏惠慶回國之後，勢必會向蔣介石說明自己的觀感。

這也使胡適上任不久，重慶上下便議論紛紛，蔣介石也開始考慮是否召他回國，只是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當時張慰慈曾寫信告訴胡適：「在重慶，程滄波對我說，『適之快要回國了』。我問為甚麼，他說，『攻擊他的人很多，尤其是顏大使和孔先生』。因為他們攻擊的次數太多，蔣先生曾說過，還是請他回來罷。」^②一九四〇年六月，蔣介石出於權宜之計，決定派宋子文去美國做自己的私人代表，負責洽商美援事務，希望以這種方式提高對美外交的層級，同時彌補胡適職責上的不足。宋子文到達美國後，蔣介石便在電報中指示：「借款事不必與胡使相商，請兄徑自進行為便。」同時又讓宋子文了解「此時擬召胡使回國，未知有否不便之處」。^③但是這種做法不符合外交慣例，很容易造成「在同一個國家有兩個大使的局面，使工作複雜化，使美國政府為難，不知該怎麼辦」。一九四八年底，蔣介石故伎重演，任命孔祥熙做自己的私人代表時，就遭到顧維鈞的強烈抵制，不惜以辭職表示反對。

所以宋子文到了美國後，很難處理與胡適的關係。何況是「老朋友」，胡適對宋子文早有成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重慶傳出政府行將改組，宋子文將接任財政部長時，胡適就打電報給陳布雷，反

對政府採取這項任命。說陳光甫在美國談判貸款，一切漸入佳境，「已有如許成績」，如果宋子文做了財政部長，他「個性太強，恐怕難與光甫合作」。^④這也使宋子文到了美國後，首先就遇到了胡適的「不合作主義」。從道理上說，胡適應該知道宋子文作為蔣介石的代表，在對美外交上的實質地位，有關這一點，蔣介石在給羅斯福的信裡說得很清楚，「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國政府在美商談一切之全權，彼受余完全之信任」，^⑤但是胡適故意漠視這一點，有意給宋子文製造難堪。據薛觀瀾在《我所知道的宋子文》中說，宋子文初到美國時，向胡適提出要走訪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和財政部長摩根索，胡適都置之不理，既不與美方聯繫，也不給他辦理手續；宋子文希望在大使館舉辦一次雞尾酒會，聯絡美國財政界的名流，也沒能得到胡適的同意。甚至美國政府招待駐外使節，胡適給白宮開出的名單，竟將宋子文列入大使館秘書之列。

宋子文此次使美，雖然很有自信，實際並無成算。因為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美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徘徊不定，還沒有放棄以往的「孤立主義」，國務卿赫爾等人都反對向中國提供援助，擔心惡化與日本的關係。胡適這種「不合作」的態度，顯然又給宋子文製造了額外的困難，使宋子文的談判地位降低，受到某些美國官員的輕視和懷疑。《紐約時報》在做新聞報道時，也只稱「中國銀行行長抵達紐約」。一九四〇年九月，宋子文曾向胡適訴苦，說幾項談判「均無大希望」，但是沒有得到胡適的諒解。胡適反而認為，這是意料當中的事，恰好證明了他對宋子文的了解，在日記中說：「此是意料中事。我當初所以不願政府派子文來，因為我知道子文毫無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來了若無大功可立，必大怨望。」^⑥陳光甫回到重慶以後，也配合胡適的說法，一方面告訴孔祥熙，「如我方

履行合約，美方必能源源援助」，似乎美援已經水到渠成了。另一方面又貶低宋子文，說自己「上兩次桐、錫借款成功，全靠彼與摩根私人關係。此次先生（宋子文）在外接洽，希望極小」。^⑦孔、宋之間本來就矛盾很深，兩人的一唱一和，又給了孔祥熙借題發揮的機會，他告訴蔣介石，宋子文「氣量狹小」，不能成事，「又謂在外接洽碎屑零星」，容有小成也無補於事。這也使蔣介石對宋子文的初期活動產生了一些錯誤認識。

但是胡適沒有料到，他太低估了宋子文。宋子文也許耐心不足，可是在「個人外交」上的能力，卻遠遠超過他與陳光甫。胡適固然在美國聲望很高，但是他與美國政府官員間的交往，只是相敬如賓，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合作關係。而宋子文到了美國，最初幾個月雖然「毫無辦法，四處碰壁」，但是掙扎不久，就將美國政府鬧得天翻地覆。舉一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一九四一年十月，蔣介石給羅斯福發去一封電報，結果電文在三天之內從三個不同渠道被送達國務院。一份由宋子文親自交給羅斯福，一份由海軍參贊麥克尤送呈海軍部，還有一份由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送呈陸軍部。宋子文到美國還不足一年，便與羅斯福親如家人。他在給蔣介石和宋美齡的信中說：「總統對文友誼，幾與家人無異，無話不談，不拘形跡，稱名去姓，親切可知。」

宋子文剛到美國時，財政部長摩根索對他不太友善，說他到處拉攏政客，向自己施壓，還責怪財政部官員：「你們到底是在為宋子文服務，還是為美國政府服務？」但是後來就對他格外賞識，說「當你不在時，一切都不對勁。幸好你回來了，我現在才知道我多麼需要你的幫助」。兩人的主客關係竟然顛倒了過來。所以宋子文三個月之後就簽署了第一筆二千五百萬美元借款，接著，又於十一

月三十日同美國政府達成一億美元的信貸。而這筆信用貸款是美國首次以政府名義貸款給中國，對奠定中美合作關係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正如美國國務卿赫爾所說：「此項行動並不易達成，它們的完成代表了非常實在的困難與希望，它們構成了對中國堅實的、非常實在的援助，它們的重要性將被完全承認。」^⑧宋子文完成第一筆貸款後，也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他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說：「欲得美國之援助，必得萬分努力，萬分忍耐，絕非高談闊論所能獲效。」將胡適送給他的「毫無耐心」幾個字，又送還給了胡適。蔣介石也改變了原來的認識，對宋刮目相看，在日記中說，自己有一「內子力助於內，子文輔佐於外，最為有力」。

只是宋子文進行得越順利，就越難與胡適相處。宋到美國之前，在美國洽談經濟合作的主要是陳光甫。陳光甫不僅為人謙誠，他以銀行家身份在美國活動也離不開大使館的配合，所以與胡適相處得很愉快。胡適也得以參與其中，了解談判的內容與進程。胡適那首著名的短詩「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就是他當時題在自己的一張照片上，送給陳光甫的。而宋子文的地位就不同了，他銜蔣介石之命「對美商談一切」，在這件事上本來就無須請示胡適，何況他與胡適合作了幾次，發現胡適雖然笑容可掬，而對實務的進行毫無助力，更有意要避開胡適，單獨與美方接觸，連與重慶之間的電報往來也改用其他途徑，不再通過大使館。這些都使胡適被置於事外，失去參與談判的機會，對於談判進程一無所知。據熊式輝在《海桑集》中說，他去美國時，胡適曾向他「密述一事」，說一九四一年初他外出演講，正準備從紐約返回華盛頓，忽然接到宋子文辦公室的電話，「告之子文即晚來紐約，有要事相商，請其務在紐約相候」，但是他在紐約守了一夜，

也沒等來宋子文。第二天一早看報，發現美國政府已經核定向國民政府提供一億美元援助，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宋子文留在紐約，是怕他「與聞其事」，要獨攬這份功勞。熊式輝聽了，覺得匪夷所思，「答以宋或真擬是晚赴紐約，故相約，未必別有心機」，但胡適堅信他的說法，說這是毛邦初告訴他的。^⑨我想胡適的猜測不無可能，但是宋子文出此下策，恐怕是既不想讓他分功，也不想讓他經手此事。胡適為了這件事曾寫信給重慶，狀告宋子文「不顧體統」，儼然要做「太上大使」，獨攬對美外交。他對宋子文的成果也嗤之以鼻，說宋靠的都是「流氓手段」。

兩人除了在美援上不能合作，在外交政策上也存在分歧。

宋子文是國民政府裡著名的反日派，而胡適在抗戰初期一直鼓吹「和比戰難」，希望與日本政府達成和談，即便以東三省作為代價，也可以在所不惜。顧維鈞在回憶錄裡提到一處細節，說一九三八年胡適初到美國時，曾去國務院見遠東司司長亨培克，說中國情況混亂，已經無法再抗戰下去，問亨培克「是否應當與日本媾和」。亨培克「堅定地回答說，中國並沒有完全戰敗」，「如果放棄戰鬥，一切都完了」。但亨培克的觀點沒能說服胡適。日本在發動珍珠港事變之前曾派來榎三郎與美國政府舉行談判，希望恢復美日間的經濟關係，放寬對日本的經濟封鎖，條件是日本承諾不侵犯海參崴和西伯利亞。當時美國國務卿赫爾傾向於接受日本的提議，採取「過渡辦法」與日本簽署一項臨時協議，暫時達成妥協，以利於美國做好戰爭準備。他為此曾向英、澳、荷三國及中國大使徵求意見，強調「過渡辦法」不只對美國有利，還可以兼顧英國與中國，使英國減輕東顧的壓力，使中國解除「滇緬路之危急」。但是英、澳、荷三國都表示反對，只有胡適認為美國有「原則已定，事在必行之意」，

只提了幾項修改意見。^⑩

宋子文對美、日動態一直十分關注，知道日本首相不久前曾致電羅斯福，希望與美國「恢復經濟關係，解除凍結，另訂通商條約」，美國方面也有「緩和派重新抬頭」，不願對日本採取「尖銳化之勢」，故得知這件事，認為事態嚴重，胡適在「千鈞一髮之際，不能勝任，殊可慮也」，立即打電報給蔣介石，指出其中的利害。蔣介石接到宋子文的電報，也發現「過渡辦法」嚴重損害中國的利益，「只要美日一旦妥協，或美國經濟封鎖略有一點放鬆，則中日兩國人民觀感，即視為美日妥協已成，中國全被美國犧牲……從此中國抗戰崩潰自不待言」。因此在接到胡適的「養電」後，立刻回電表示：「此次美日談話，如果在中國侵略之日軍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以前，而美國對日經濟封鎖政策，無論有任何一點之放鬆與改變，則中國抗戰必立見崩潰。」^⑪隨即又致電宋子文，要宋子文將他給胡適的回電，「轉告其海陸總長，並譯送居里一份，再口頭說明此事嚴重之程度」。^⑫要宋子文向美國政府表達「堅決正當之立場」。^⑬據蔣介石的顧問拉摩鐵爾說，蔣介石當時「反應之強烈」，「其激動之狀，實前所未見」^⑭。好在經宋子文的斡旋，在海軍部長諾克斯、陸軍部長史汀生、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強力支持下，最後說服了羅斯福，美國政府放棄了「過渡辦法」。宋子文後來向顧維鈞提起這件事時，認為胡適受了赫爾的蠱惑，「以為赫爾之方案，為循守美國已定之政策，不可變更」，不敢在原則上力爭，維護國家利益，「幾致貽誤事機」。^⑮

正因為這樣，宋子文到了美國不久，就屢次上書蔣介石，要求撤換胡適，改任施肇基為駐美大使，或者任命自己做行政院副院長，以利於在美國便宜行事。但是蔣介石都沒有同意，以致宋子文在

電文中懇求：「國際風雲日亟，更非外交方面之協助，不能相與有成。此次向總統陳商各要務，經過幾回周折，始得其切實答覆，處境困難，可想而知。長此以往，不但文不能盡責，有負委任，適之亦屬難堪。」¹⁶我認為，蔣介石沒有及時撤換胡適，在當時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他不滿意施肇基，對其「感想平平」，還在考慮人選問題；二是有人幫胡適說話，說胡適在美國深得人心，使蔣介石擔心撤換胡適會傷害美中關係。「對此事處理當須研究至當方能決定也。」我認為，當時維護胡適最力的主要是王世杰。王世杰是抗戰後期蔣介石的核心幕僚，在處理歐美外交上很有發言權。從《王世杰日記》中看，胡適任駐美大使不久，地位便岌岌可危。他於一九四〇年五月三日記了日記：「陳布雷自成都來電，謂駐美使節問題已入嚴重階段。余因電蔣先生指陳三點：（一）戰時外交人選，非有重大過失不宜常換。（二）胡適之如被內調，彼或拒絕新職。（三）適之信望在顏、施諸人之上。」¹⁷在這之後，胡適每次遇到危機，也都是由他出面解圍。他為了替胡適排憂解難，甚至建議蔣介石召回宋子文，「謂子文不必久留美國，宜令回國」。只是蔣介石「未作表示」¹⁸。

宋子文為了撤換胡適，還動用過「上層路」。一九四一年六月，錢昌照電告宋子文，李石曾到了重慶。宋子文立刻通過錢昌照，請李石曾向蔣介石進言。此後又親自打電報給李石曾，說：「時局變幻萬端，緊張日甚，我國在美外交亟待調整，務乞催促委座早日裁定，俾利進行，毋任企盼！」¹⁹並提醒李石曾，此事不必與郭泰祺商洽，以免又受王世杰阻撓。但是李石曾兩次進言都沒有收效，反而有些適得其反。據錢昌照在電報中說：「石曾先生兩次見介公，屢次談及先生，介公總不接嘴，對適之更不提起。」李石曾也發給他一封長電，其中提到：「以弟觀察，介公、孔夫人皆避談兄事，介

公且避談適之，故擬緩言……介公用人行政，自有權衡之見甚深，雖常命兄做事，但絕不願由兄使其被動。」^②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郭泰祺以行事荒謬，被蔣介石免職，宋子文接任了外交部長後，才終於如願以償，從職務上明確了與胡適的「上下級」關係。據吳國楨說，當時大家對他寧願授人以柄，也要遙領外交部長的頭銜，有過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之一，就是他要改變一部分美國人的誤解，認為他在美國的身份「較大使為低」。

只是宋接任了外交部長後，便開始利用行政手段處理他與胡適的關係。例如胡適在美國的外交活動，主要是應各大學、社會團體的邀請，去美國各地演講。用唐德剛的話說，就是「行萬里路，講百次演」。客觀地說，胡適的這些演講在美國廣受好評，連加拿大政府也曾主動請他去當地演講。但是胡適演講的內容又五花八門，有些只是泛談學術與人生，無關國際政治與中國的抗戰，讓宋子文不以為然。他請胡適以後演講要注意多談時事政治，少談考據文學，但胡適還是我行我素，對宋子文的建議置之不理。宋子文一怒之下，行文給大使館，要求大使館今後發表任何文稿必須先送他過目。宋這項規定固然是國際外交上的常規，但在中國還沒有先例。他在處理外交事務上，更將胡適當做外人看待，不讓胡適有深入了解的機會，胡適一個堂堂駐美大使，竟然被廢為閒曹，「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出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③。

胡適歷來自視甚高，如何受得了這種冷遇？一九四二年四月，熊式輝到美擔任軍事代表，胡適與他本來沒有多少私交，卻向他大吐苦水：「以前各事皆頗易辦，宋子文到此之後，因其性格不易與人合作，相處實感痛苦。」胡適在送熊式輝時，又向他表示：「君有諸葛之稱，宜可借箸代謀，為我解

除現職，救出火坑。」²²日後不久，胡適在給王世杰、翁文灝兩人的信中，還提到他早在「去年十二月，即決定辭職了，但不久即有復初（郭泰祺）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費解釋。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²³從這段話裡就可以知道，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後，胡適心情壓抑的程度，幾有度日如年之感。胡適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自己在最後這半年真是以身作則，示範了這句格言。

以上這些內容，就是兩人在美國相互「排斥」的經過。

現在回過頭去看，誰是誰非很清楚。要而言之，不是宋子文排斥胡適，而是胡適排斥宋子文。宋子文在美國的身份，蔣介石在給羅斯福的信裡說得很清楚，他既是蔣介石個人的「私人代表」，也是國民政府在美國的「全權代表」，有關這一點，美國政府可以拘泥外交慣例，在程序上有所挑剔，但是胡適心裡不能不明白。然而胡適卻不顧大局，故意漠視這一點，不斷給宋子文製造難堪，這種做法是極不明智的。更嚴重的是，他對宋子文在美國的活動，不但不積極配合，還對外邀功諉過，將宋子文的談判成果說成是自己的功勞。例如一九四一年八月，宋子文經過與美國軍部的多次協商，最終說服了羅斯福，同意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這項成果對推進中美關係、穩定抗戰大局具有重要意義，實在得來不易，但是胡適卻「屢次不顧事實，顏自我宣傳」，²⁴這勢必嚴重損害兩人的關係。

當然，兩人之間的不合，也與宋子文的個性有關。宋子文早年生長於美國，對中國文化缺少了

解，不習慣中國的官場作風，從政後又長期位居要衝，行事作風剛毅、勇銳，在處理事情上常常不近人情，遠不像孔祥熙那樣圓滑、世故。例如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國務卿赫爾在盛怒之下，痛斥日本政府「不守信義」，將日本駐美大使逐出客廳。消息傳出後，美國記者曾就這件事訪問胡適，當時胡適正在浴室洗浴，沒想到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做有利中國抗戰的宣傳，隨便以「向無所聞」應付了記者。而宋子文一向重視輿論的重要性，第二天從報上看到消息後，就當面責問胡適，言語之間顯然有些不顧情面，令胡適覺得備受侮辱，一怒之下便提出辭呈。蔣介石見了，只好親自批上「勉為其難」一句，對他竭力加以挽留。

再遠一點說，當時除了胡適以外，其他一些接觸過宋子文的人，也對宋子文有強烈的不滿。例如李璜在《學鈍室回憶錄》、張忠絃在《迷惘集》中，都對宋子文的行事作風非常反感。據李璜說，一九四五年四月，宋子文率團出席舊金山會議時，十餘人同乘一架飛機，一路上「其『大少爺』之生活習慣，在天空中仍不能改，一人以橡皮氣墊鋪於運輸機中間，長臥其上，使我們坐於兩側吊椅之同行者，竟腳都不能伸出，而他則臥在我們腳下，或看書，或喝白蘭地酒下火腿與花生米，旁若無人，令我厭惡！」張忠絃還提到：「宋子文素喜一意孤行，更喜人伺候周到。怒，則可在旅館樓梯當英國、南非代表前，以粗俗語句，責罵中國代表團新聞官員。後者難於忍受，因而涕泣辭職。」凡此種種，都是宋子文行事傲慢、不近人情之處。傅斯年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裡，對宋子文更極盡挖苦，說宋子文「儘管英國話流暢」，但在美國結交的都是下三濫，「登不了大雅之堂」。平時待人也粗魯無禮，每次請客都「無話可說，最客氣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夾菜，此謂之

餽客，非請客也」。

只是這些即便都是事實，問題的關鍵還在不滿者自己，不在宋子文。當時宋子文貴為行政院長，又是「皇親國戚」，他能與普通隨員坐同一架飛機，彼此胼手胝足，朝夕相對，這已經很不容易。更何況他還會主動請客，甚至「餽客」，這在今天亦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所以他們對宋子文的不滿，主要要是因為「去古未遠」：他們在西風東漸的影響下，不僅沒有去掉士人社會的遺習，還在大學學府裡養成了一些妄自尊大的「民主」風氣，這兩者變本加厲，令他們從政後慣以專家自居，以政壇為講壇，以政務為教業，但凡有地位不受尊重，意見不被採納的時候，便認為對方傲慢，不尊重專家，對他耍官僚主義。而身為外交事務專家的顧維鈞，因為在政壇上有長期的歷練，懂得人情事理，對宋子文的行事作風就有不同的觀感，他認為宋子文「永遠堅定果斷，不拘細節」，「確實是位一流的行政官和實幹家」。²⁵

兩人對於這些不快，事後的態度也截然不同。胡適是一直耿耿於懷，對宋子文不能諒解。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在給傅斯年的信裡說：「行政院長必須換人，雪艇、哲生都比子文高萬倍，都可以號召國內國外的同情。若用子文，則國內無以號召，美國借款也借不成。」²⁶這些話依然不顧事實。王世杰、孫科做行政院長是否會比宋子文更高明，這裡姑置不論。美國的對華借款，卻大部分是經由宋子文完成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一點二五億美元，還有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五億美元，特別是這五億美元沒有規定利率和償還期，也不用擔保，不限用途，是抗戰時期美國對國民政府提供的最優惠、數額最大的一筆借款。反觀胡適，成績就很有有限，他在四年大使任上留下來的都是「無形資產」。白居易曾經

寫過一首詩：「十年為刺史，無政在人口。惟向郡城中，題詩十餘首。」這與胡適何其相似？兩人的區別是，白居易肯於自嘲，而胡適只有自負。反過來看宋子文，他對胡適卻不計前嫌，將以往的不快忘得一乾二淨。他在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為了挽救國民黨政權的崩潰，接受顧維鈞、蔣廷黻的建議多次上書蔣介石，提請胡適擔任行政院長，建立一個「自由主義政府」。從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宋子文的單純和誠摯。

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有關兩人的評價，仍是大部分偏袒胡適，對宋子文十分苛責，甚至說宋子文是個「天厭之」的小人。連胡適在應對「過渡辦法」時的軟弱行為，也未被深究，反倒說成是胡適「最成功的一項外交勝利」^{②7}，「適之先生之功業，垂百世而不滅」^{②8}。想起來，其中的道理也很簡單。在這件事上積極發言、掌握「話語權」的，無例外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當中許多人即便不是胡適的弟子門生，也與胡適同氣相應。因此，在評論胡、宋兩人的是非時，怕說出真相既貶低了胡適，也傷害了自己，以致這樁簡單的公案到今天還是顛倒是非，沒有公正的結論。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註釋：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中華書局，1978年，第162頁。

- ② 《胡適來往書信集》，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368頁。
- ③ 吳景平、郭岱君編：《宋子文駐美時期電報選（1940—1943）》，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1頁。
- ④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台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0年，第1688頁。
- ⑤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3），台北：「國史館」，第639頁。
- ⑥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2頁。
- ⑦ 錢昌照致宋子文電（宋子文檔案，第42盒第6號文件夾）。
- ⑧ 美國國務卿赫爾、政治顧問郝恩貝克與駐美代表宋子文、大使胡適談話中之正式聲明。轉引自陳立文《宋子文與戰時外交》，台北：「國史館」，第22頁。
- ⑨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第338頁。
- ⑩ 詳見胡適致蔣介石「養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第488—492頁。
- ⑪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第499頁。
- ⑫ 同上書，第506頁。
- ⑬ 《宋子文駐美時期電報選（1940—1943）》，第134頁。
- ⑭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7），第501頁。
- ⑮ 《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中華書局，1983年，第113頁。
- ⑯ 宋子文致蔣介石震電，見《戰時外交》（一），台北：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1981年，第144頁。
- ⑰ 《王世杰日記》，第2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年，第267頁。
- ⑱ 《王世杰日記》，第3冊，第63—64頁。
- ⑲ 宋子文檔案（第42盒）。
- ⑳ 宋子文檔案（第46盒）。
- ㉑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777頁。
- ㉒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第339頁。

- ②③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777頁。
- ②④ 宋子文檔案（第42盒）。
- ②⑤ 《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第507頁。
- ②⑥ 《胡適來往書信集》，下冊，第174頁。
- ②⑦ 張忠棟：《胡適五論》，台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130頁。
- ②⑧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746頁。

再說胡適與宋子文

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曾與宋子文發生過許多不快。對此，我在上文已經做了介紹。不過我寫上篇文章時，主要想澄清兩人的是非，難免有為宋子文「翻案」之意，對兩人在外交意見上的分歧，沒有太做分析。現在回頭去看，兩人都不是職業外交家，特別是胡適的「學者外交」，在民國外交史上還是首例。因此兩人之臨危受命，對各自的職責都有不同的認識，正是這些分歧導致兩人合作中的不快；至於相互間的意氣之爭，反而不是主要問題。

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胡適上任以後，便致電孔祥熙，聲明駐外使節的職責是要「替國家掙面子」，而不是與對方談生意，因此提出了一個「四不主義」：不談借款，不談美援，不做宣傳，也不從事募捐活動。他還幾次要求政府派人來美國，專職處理這些瑣碎事務，以免自己「致遠恐泥」。當時的國內輿論也高調支持他這種「高姿態」外交。例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便在自家報紙上發表社論，題目為《胡大使抵美》，「盼望胡大使」上任後，「代表中國政府並代表我們全體人民，向美國說正式的話」。所謂「正式的話」，就是「美國朝野是否還瞧得起在患難中的中國民族？是否認為中國是美國值得合作的朋友？這個判斷，應當是美國人自己之事，我們不勉強，也決不乞求憐憫」。

正因為這樣，胡適在任駐美大使期間，一直依照這一原則行事。他在與美國政府打交道時，始終保持不卑不亢，在美援問題上不急於求成，甚至主動為美國人著想，建議蔣介石對美國人要有耐心，認為國際局勢發生變化後，美國政府會主動放棄「孤立主義」的立場。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經過長期「苦撐待變」，發現美國人站在白種人的立場上，竟然將戰略重點放在了歐洲，而將中國戰場置於次要地位，使大批曾經許諾給中國甚至正運往中國的物資，被中途改運英國，不免對美國產生了不滿。胡適在這種時候，更是義不容辭，主動站出來替美國人辯護，勸告重慶政府「眼前第一要義，在於弘大度量，寬恕朋友，體諒朋友在大患難之中，有時顧不到我們，切不可過分責備朋友」。他還以自己過人的理解，認為「今日我們所受困難，只是英美自己也受更大的困難，更大恥辱。他們顧不到我們，他們心裡實在認為最大恥辱。但他們的日夜圖謀雪恥，嘴裡說不出，只是咬牙切幹」。這種時候「我們必須體諒他們的苦衷，才夠得上患難朋友」。^①

胡適這種處處「替別人著想」的外交風格，當然令美國外交官別開生面，獲得以往外交經驗中所沒有的感受，對他產生好感。只不過僅憑這些好感，還談不上「替國家掙面子」。所以他認為最好是與美國社會直接接觸，通過自己的發言與展示，改變美國對中國的印象。這也使他在外交策略上有一種獨特的認識，認為眼下對美外交的最大困難，不是美國不幫助中國，而是美國不了解中國。美國社會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當年制定《排華法案》時，對華工的印象上。因此抗戰爆發後，美國媒體雖然做了許多有利於中國的報道，換來的只是廉價的同情：「呀，可憐的中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抗戰事業是與民族的獨立、自由和民主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這種廉價的同情，無法改變美國現行的「孤

立政策」。

所以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後，便經過精心準備，在紐約發表了一篇演講，題目是《日本侵華之戰》。他在演講中說，當年美國獨立建國運動能夠成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艱苦奮鬥，有誓死達到目的的決心；二、是法國對美國人民的精神與物質援助。這兩者缺一不可。他說今天中國的抗戰，雖然在歷史背景上不同於當年的美國獨立運動，但是追求獨立、自由的目標是一致的。中國目前的最大困難是技術低下、生產能力落後，缺乏抗戰所必需的物質條件，而這一切，只能期待世界上愛好自由民主的國家，給予積極的支持與援助。據說他在演講當中，便感覺到胸口悶疼，回到宿舍，又出現了嘔吐。他本來以為是消化出了問題，不料下午去看醫生，被診斷為心臟受損，經過七十多天的住院治療，才回到華盛頓任所。但是他出院以後，還是不放棄去各地演講的機會，努力向美國社會介紹中國的抗戰事業。他在駐美大使任上，總共發表過多少次演講，至今還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是他自己說，他在一九四一年這一年，便「旅行一萬六千多英里，發表演講百餘次」。^②

而宋子文到了美國，就無法像他這樣超脫。他作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清楚地知道他這次到美國的目的主要是尋求經濟援助。正如蔣介石在電報中說的：「此時我國抗戰最大困難為經濟，而武器尚在其次。美國若不在金融上從速援我救濟，則中國內外情勢實難持久。」因此他在外交策略上，不可能接受胡適的說法，認為對美外交的最大困難是美國不了解中國，一切都需要從頭做起，只有在民意成熟後才能有所展佈；反而認為對美外交的最大障礙，來自於雙方利益的不平衡。在一九三六年之前，中國本來是美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伙伴，但一九三六年後，日本已經取代了中國的地位，

美國對日本的進口與出口都遠高於中國。美國在日本的投資總額更幾近在中國的兩倍。所以對於美國而言，日本的經濟利益遠大於中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會為了追求「道義上的援助」，放棄實際的經濟利益。有件事足以說明問題。抗戰爆發後，歐美國家曾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討論按照國聯憲章第十六條的規定對日本採取經濟制裁，結果因為美國的強烈反對，會議未能達成一致，取得任何實際成果。所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雖然接受中國的請求，向中國提供了少量的商業貸款，但同時也加大了對日出口，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鋼鐵、汽車、機械等等，支持日本的對華戰略。這都說明對美外交的關鍵，是要說服美國政府從長計議，使他們能夠看到在中國的潛在利益。

於是宋子文到了美國後，便開始走「上層路」，側重與美國政府、國會的上層人物打交道。他為了達成目標，除了四處遊說，有時還會不擇手段，施展一些小恩小惠。據說，在宋子文的個人檔案裡，收有不少美國官員的謝函，諸如「感謝你送的聖誕禮物兩罐茶葉」，「謝謝代送我的漂亮袖扣」^③一類。當時重慶方面還風傳他在美國生活腐化，陪美國人喝酒、打橋牌，套交情。其實他的這套外交攻略，最初並不順利。他給蔣介石的電文中說：「在美六月，初來時循規蹈矩，毫無辦法，四處碰壁，至最近兩月，始有門路。」^④可見他在美國的最初幾個月，遭到過許多白眼，也受過不少冷遇，被人諷刺為「那個時代最不知難堪不怕疲倦的遊說家」。我認為，他後來能夠改變處境，在對美外交上取得突破，主要是得到了羅斯福的關照。據說，羅斯福早在一九〇二年就知道日本人野心勃勃，制訂了一項「百年擴張計劃」，準備一步步將朝鮮、中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包括夏威夷在內的太平洋島嶼納入

自己的版圖，所以盧溝橋事變後，他便對日本的動態「越來越關注」，在辦公室的牆上掛了一張巨大的太平洋地圖，並開始考慮對日本實施禁運的可能性。他這種明顯同情中國的態度，給了宋子文以接近的機會。宋子文自一九三四年五月藉出席倫敦世界經濟會議的時機，途經美國會見羅斯福，雙方共同發表了「希望迅速恢復亞洲和平」的聲明後，便與羅斯福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曾告訴顧維鈞，說他在美四年，一直「致力於培植同羅斯福的關係」^⑤，將羅斯福作為他外交努力的重心。他還在給蔣介石和宋美齡的信中說：「總統對文友誼，幾與家人無異，無話不談，不拘形跡，稱名去姓，親切可知。」這絕不是吹噓。從他與羅斯福的談話記錄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兩人的親密關係。

為了說明這一點，還可以舉一個小例子。據施肇基說，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曾向他發過牢騷，說有一次在軍援問題上，宋子文因為與他意見不合，便越過他「對白宮進行工作，拿到總統辦公廳一封信」，信上指示他「要滿足中國的要求」，史汀生說到這裡還勃然大怒，說他「活到這麼大年紀，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要逼他行事都不行！」正因為這樣，宋子文在出席舊金山會議時，聽到羅斯福病逝的消息，便預感到這對「中美兩國的全面關係，將發生重大影響」，中國政府今後在對美外交上，將遇到很大的困難。他為了亡羊補牢，當時還給蔣介石寫了一份報告，其中說「美國對華，在職離美後，僅賴羅斯福對我國特表好感……此後對美外交，應充分對各方面均加活動，因新總統對華認識較淺，有為左右搖動可能」。^⑥

當然，說宋子文「走上層路」，不等於說不重視輿論宣傳。他出任外交部長後，還兼任了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的會長，認為「抗戰時期，國際宣傳非常重要，必須展開工作，加強國際援華力

量」。他為此還在中國銀行開設一個賬戶，交代分會的實際負責人，需要用錢的時候可以隨時到中行領取，不必先向他請示。^⑦他在外交活動中也同胡適一樣，重視公共外交的作用，兩人「在以講演推動美國對華認識上，應當是不分軒輊的」。據台灣學者陳立文女士說，宋子文檔案中「有累累的講演稿」。不過他對公共外交的認識，與胡適各有偏重，他的演講更有「功利性」，喜歡利用輿論為自己造勢，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而不是像胡適那樣，以美國民眾為目標，希望以自己的親身展示，在美國人心目中樹立一個新的「中國人」形象。

以上就是兩人外交策略上的不同。評論兩人的高下，有很大的困難。具體地說，胡適的外交策略，在當時得到過許多好評，有些支持中國抗戰、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美國人，還建議中國政府多派幾個「胡適」，深入美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的抗戰事跡。美國作家賽珍珠根據胡適的講述編寫了一部短劇，介紹孫中山生平故事，「強烈告知美國人：孫先生已改變了古老的中國，民國建立已經三十餘年！」然而，這種外交策略畢竟緩不濟急，胡適與陳光甫合作，經過一年半的努力，只獲得四千五百萬美元抵押貸款，杯水車薪，不可能滿足抗戰的需要。在胡適任駐美大使後期，熊式輝曾任軍事代表團團長，赴美處理軍援與經濟合作問題。熊式輝當時的日記有些已經以自傳形式出版。從日記中看，他剛到美國時，在胡、宋之間很同情胡適，對胡適說「君與宋君，一為聖賢襟度，一為英雄手法」，宋子文「功利心急，伎求太甚」。^⑧但是過了不久，他對胡適的看法就有所改變，認為胡適「書生本色，到處天真」。他還在日記中說：「魏道明來談，伊將調任駐美大使，其所談論較胡適為強，此後中美外交，或不致如前之陷於停頓狀態中。」他又建議魏道明，「對美外交應

改變作風」，不能「不生不死不痛不癢地仰人鼻息」，要採取積極的「革命外交」。認為「中國馴羊態度之外交，絕無成功之望」。⁹不僅如此，劉鏞說胡適任駐美大使時，他曾任大使館參事。據他所知，蔣介石最後決定解除胡適駐美大使職務，熊式輝的意見起了關鍵作用。「劉說是熊式輝將軍插手。按熊的說法，胡適對熊率領的軍事代表團未予協助。熊對諸如為中國宣傳和美國排外法等涉及外交的問題比較關切，更使他認為胡適不夠積極。」¹⁰

相比之下，宋子文的外交策略卻很快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這既得益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也離不開宋子文的「個人外交」活動。抗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大部分也是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完成的。但是他採用的外交手段，也因為「枝求太甚」，經常不符合外交程序，引起一些美國官員的抱怨。尤其是美國陸軍部對他積怨甚深，給後來的中美關係留下隱患。一九四二年八月，居里再次到重慶訪問時，向蔣介石表達過不少對宋子文的不滿。說宋子文行事粗糙，逞勇好鬥，經常為了一些小事上羅斯福那裡告狀。中美之間的所有不快，「一半來自宋部長與軍部間之摩擦」¹¹。因此，宋子文雖然在對美外交上成就顯著，為抗戰事業做出巨大貢獻，自己卻聲名狼藉，長期不被輿論所諒解。許多人認為他的外交成績都是「靠流氓手段」獵取的，在胡適「行萬里路，講百次演」，為「國家撐面子」、領回二十幾個榮譽博士學位時，他正在美國到處丟人現眼。傅斯年還揭發說，有美國人告訴他，「你看他（宋子文）交結的是些甚麼美國人，便知道他是甚麼人。」¹²他得罪了胡適這件事，更是貽害無窮。可以說，他出任行政院長後，「北大派」就蓄勢待發，沒有停止過倒閣活動。

我認為兩人間發生不快，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抗戰立場不同。兩人在外交策略上的分歧，

說到底，也是抗戰立場的反映。宋子文在國民政府中，一直是著名的「主戰派」人物，據《美國對外關係文件》，日本人一直將宋子文視為「實行他們計劃的障礙」，試圖通過「加強親日派分子的力量」，削弱宋子文的地位。而胡適則長期堅持主和，是「低調俱樂部」的主角，認為中國還是一個「中世紀國家，無法去打一支現代化軍隊」。我這樣說，不是有意貶低胡適。以當時的社會情勢而論，主和派固然是少數，但在社會上層卻佔多數。有些號稱主戰派的，實際上也陽奉陰違，內心裡還是一「失敗主義者」。特別是武漢失守後，政府信心動搖，悲觀情緒氾濫，不少「主戰派」也偃旗息鼓，投向「主和派」陣營。除了汪系人馬之外，孔祥熙、陳果夫、張群這些蔣介石身邊的核心人物，也開始主張對日和談，認為「和議亦當考慮」。美國通訊社當時曾對事態的發展做過報道，說武漢失陷後，國民政府內部「主和派」勢力抬頭，主張「汪精衛先生代蔣主政，中國加入共同防共協定，蔣下野」。所以胡適倡導和談，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問題是胡適的這種立場，畢竟與自己的外交職責存在矛盾，使他在對美外交上安於現狀，缺乏積極的進取精神。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他曾打電報給胡適，告之蘇聯與英、法兩國在遠東問題上都希望能夠與美國合作，對日本採取制裁措施，希望胡適能主動與美方接觸，說服美國政府響應三國的意願，採取積極的合作態度。他還將這件事通報給了蔣介石。蔣介石也隨即致電胡適，「責成他抓緊辦理」。結果胡適在回電中說，美國人反應冷淡，告訴他「按其政府體制，美國無法批准這種合作」；「華盛頓的觀點是」英、法兩國可以主動採取行動，「如果一切都要等待美國的合作，實際上等於逃避責任」。至於美國會怎樣做，這是美國人自己的事，「完全取決於美國政府領